

曼佐尼公平正义思想研究

——以《耻辱柱的历史》为例

杨和晴

摘要：亚历山大·曼佐尼不仅是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时期的文学巨匠，还是一位具有民族情怀、人文关怀和理性思想的学者。其历史评论作品《耻辱柱的历史》，原是代表作《约婚夫妇》的附录，讲述了米兰瘟疫中的耻辱柱事件，除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黑暗之外，还体现了曼佐尼的公平正义思想特点。曼佐尼针对耻辱柱事件阐发的评论思想兼具19世纪初的时代特点和作家本人的原创性，对当今的社会治理都有深远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曼佐尼；《耻辱柱的历史》；公平正义

作者简介：杨和晴，女，助教，文学硕士。（浙江外国语学院 西方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310023）

中图分类号：I546.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8) 02-0137-05

引言

亚历山大·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是19世纪意大利著名文学家和学者，创作了诗歌、小说、戏剧等不同类型的作品，继但丁之后提出以托斯卡纳方言为基础建立统一民族语言的主张，其以托斯卡纳方言创作的浪漫主义代表作《约婚夫妇》（*Promessi sposi*）深刻影响了意大利现代小说的创作模式。《耻辱柱的历史》（*Storia della colonna infame*）这部历史作品在1840年出版，最初作为《约婚夫妇》的附录，讲述了小说剧情中发生的一段历史——1630年米兰瘟疫中的一例真实事件。故事中的卫生专员皮尔扎（Guglielmo Piazza）和理发师莫拉（Giangiacomo Mora）在酷刑的折磨下承认了传播瘟疫的莫须有罪名，他们的名字被刻在了用来记录罪人的石柱上，当局称之为“耻辱柱”（*colonna infame*）。这部历史作品对《约婚夫妇》的文学主题进行了扩充和深化，愈加充分地反映了17世纪意大利的社会风貌和风气：耻辱柱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法官、大众以及政府对这些可怜人犯下的罪恶。这部历史作品生动再现了瘟疫时期的米兰，并深入分析了不同方面的社会情况，尤其是司法权力的滥用现象。耻辱柱的历史是瘟疫治理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也是一段充斥着司法暴力和愚昧的历史。这部作品，与其代表小说的浪漫主义风格不同，揭示了曼佐尼在国内鲜为人知的冷峻的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想的一面，从而进一步加深和丰富了人们对其文学作品风格特点的认识。

1630年，米兰城爆发了大面积瘟疫，市民接连死去，人心惶惶，过去繁荣的城市被笼罩在死神的阴影下。在医疗科学水平欠发达的时代，对统治者和人民来说，瘟疫是一个凶残的敌人，它的可怕之处在于其治愈之困难和传播之迅速。当时瘟疫的防治，通常采取隔离措施，将瘟疫病人同普通人隔离开来，并辅以严密的社会监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信息的闭塞和科普的缺乏，人群中的恐惧心理逐渐滋生。一天，一位妇女从窗口看见路边一位披着斗篷、形迹可疑的路人，他边走边将手放在围墙上，看上去似乎在涂抹着什么。当时人们相信有心怀恶意的人到处涂抹有毒的膏体和粉末来传播瘟疫，这

位妇女十分心慌，就向当局告发了这位路人，小说故事由此开始。官员们顺藤摸瓜地找到了小说主角，也就是卫生专员皮尔扎，将他抓来严刑拷打，问有没有同伙，皮尔扎招架不住，说出了理发师莫拉的名字。莫拉被抓后经不住酷刑又招了其他人的名字，如此循环往复，在抓捕了一大批人后，贵族帕蒂拉（Gaetano de Padilla）也牵涉其中。最后，贵族帕蒂拉在漫长的司法审查之后被宣告无罪，其他嫌疑人皆被处死刑，他们的名字被永远刻在耻辱柱上。

对于那些姓名被刻在石柱上的人来说，他们的清白从此被水泥浇铸尘封，直到18世纪末意大利启蒙主义学者皮耶特罗·维利（Pietro Verri）首次揭开了耻辱柱的真相。曼佐尼不仅以历史作品的形式重现了这一历史事件，还在其中展开了许多深刻的论述分析，既是对《约婚夫妇》中17世纪意大利社会背景刻画的完善，也是曼佐尼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思想体现。

一、批判愚昧惑众，主张回归理性

曼佐尼强调平民开智，人们应当回归理性，避免武断臆测。他批判了引发耻辱柱事件的谣言现象以及法官在处理皮尔扎和莫拉等人案件过程中的草率行为。

在这场米兰瘟疫中，人们相信有一群人，通过向井水与河水投入有毒的粉末或是膏状物，恶意传播瘟疫。正是由于这种想法作祟，无辜的皮尔扎才会被举报传播病毒，原因仅仅是他将手放在墙上，扶墙而行。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对瘟疫的恐惧可以带来关注和谨慎，但更多的，还是精神上的不理智，正如历史学家穆拉托里（L. A. Muratori）说的“传言说有人用巫术、有毒的膏药和粉末来杀人，虽然这个传言最初言辞闪烁、语气十分不确定，也没有人实际见过，但只要一开始传播，那就如同长了胳膊和腿，最后在大部分人的心里成了不可辩驳的事实。”^{[1](116)}在此，穆拉托里明确揭示了谣言的威力，即假的也有可能成为真的。除了1630年的米兰瘟疫，历史上其它传染病爆发时，也有类似情况，例如1321年法兰西王国的麻风病人阴谋论，当时人们认为有一群麻风病人试图在水中投毒，传播病菌，历史学家金兹博格（Carlo Ginzburg）在他的书中记录了这种传言：“麻风病人，‘身体和灵魂都病怏怏的’，在泉水、井水与河水中撒入有毒的粉末，为了将麻风病毒传给健康的人，让他们得病或是死去。”^{[2](5)}另外，和麻风病人一样处在社会边缘的犹太人也被告控参与了这场阴谋。事实上，不管是米兰瘟疫的谣言还是麻风病人的谣言，除却内心恐惧，还反映出人们潜意识中的一种观念——“他们”（瘟疫病人）已经不再是“自己人”，而是变为另一个群体，一个对他人健康产生威胁的群体。

这种谣言盛行的现象有其必然性，一是由于理性声音的弱势，二是因为当时人们受教育程度较低。在当时的环境中，有一些人则不相信毒药膏和粉末的传言，正如穆拉托里说的“在米兰有一些明智的人们，他们受人敬仰，且并不相信有毒药膏的传闻，据传这些药膏在城市中到处都有，在那场瘟疫中引起了轩然大波。”^①然而他们出于舆论的压力没有挺身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是没能说服他人，因此这些微弱的声音最终被埋没了。另外，谣言和真实信息相混合，加强了传闻的可信度，于是凭借人们的想象，由谣言又产生了新的谣言。^{[3](22)}与此同时，民间医学常识的缺失也使谣言具有极大的滋生空间：由恐惧心理产生的无限想象，以及权威辟谣声音的缺席，都让传言从开始的萌发状态迅速成蔓延之势。这样的舆论环境成为了耻辱柱的一块砖，曼佐尼在书中对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做了批判。曼佐尼对于两位举报主角的妇人用词——donnicciola 便可以看出他对这类行为的否定态度，因为 donnicciola 是 donna（女人）的延伸词，含贬义，特指那些出身卑微、胆小怯懦的长舌妇。

由此可见，在医学欠发达的年代，作为被瘟疫的恐惧所笼罩的群体，大部分群众已经失去了理智，而政府和司法机构屈从于群体意识，丢弃了理性，选择牺牲少部分人来平息群众的怒火和恐惧。少数人的生命成为了舆论和平的献祭品。

① 转引自 Cottignoli, Alfede. (1994). *Alla luce del vero*. Bologna: CLUEB, 16-17.

二、批判司法不公，主张人人平等

曼佐尼具有非常明显的启蒙主义思想。其人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在这部小说中贵族帕蒂拉和其他平民嫌疑人的对比描写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展现不同阶级在这一事件中的不同境遇，曼佐尼批判了当时的司法官谨慎对待贵族人士，却对平民粗暴审讯并草率审判的双重标准。他认为，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而任何人在受到指控时，都理应受到谨慎合理的对待，不应有贵族和平民之分。

曼佐尼认为，司法系统不负责任是酿成悲剧的主要原因，其中包括司法公平缺失、滥用酷刑和态度草率。这些行为使得事件真相被扭曲，许多无辜的市民被卷入其中，受到无情的折磨。事实上，作为区分好坏的社会准绳，法律本身无过，只是需要改进和完善，而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是执行法律的法官以及获取证据和供词的过程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

在作品的最后几章中，曼佐尼在讲述事件发展的同时，将贵族人士帕蒂拉和下层平民的审讯过程进行了比较，揭示了其间明显存在的不公平现象：法官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谨慎地反复研判帕蒂拉的行为和陈述，然而莫拉等被告却很难得到有力的辩护，对此曼佐尼描述了一段公证人员拒绝为莫拉辩护的言辞，并评论说“伴随着这些话，无辜者向不公的现实苦苦哀求，希望得到帮助。”^[4](146-147)他们所得到的辩护只是一种走过场的形式，为了让他们“合法地死去”。另外，处理帕蒂拉案的过程经历了三次辩护，然而平民被告却没有这样的待遇，当两位主角请求辩护延期，法官们只允许他们延期至第二天。在这部分内容中，怀着对下层人民苦难的关怀，曼佐尼为无辜死去的平民发出了呐喊，批判了当时法官们判决的区别对待。

在《耻辱柱的历史》中，和对待帕蒂拉的谨慎态度相比，法官们对待平民嫌疑人的态度可以用草率二字来形容，具体主要表现在对被告口供中逻辑矛盾的忽视。尤其是在皮尔扎和莫拉的供认相互之间存在很多矛盾和漏洞，然而这一切都在后续的司法程序中被忽视了，在第五章的开头，曼佐尼指出了口供间的矛盾问题，即在同一件罪行中，两位不同的罪犯有着不同的动机和不同的时间顺序，而法官并不关心这明显的漏洞，他们只是想利用这份口供让他们的罪名成立。因此，对于法官来说，两位嫌犯口供的逻辑、可信度和合理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对所谓罪行的承认，也就是口供本身。如此，法官的真实目的暴露无遗——让他们变得有罪。

三、批判权力滥用，主张司法规范

在这部作品中曼佐尼强调规则意识。他鞭笞了事件中的司法恶行：一是虚假的豁免承诺，二是酷刑的滥用，扩大到整个事件中，就是权力的滥用。酷刑本身的确不人道，而曼佐尼认为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具体的法律规则来规范酷刑的使用，更确切地说是规范法律的执行过程。只有将司法权力关进规则的笼子里，才可避免出现耻辱柱事件中屈打成招、草率结案的现象，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才可得到保证。

为了从皮尔扎和其他嫌疑人的口中得到承认罪行的口供，豁免承诺这种伎俩被多次用在他们身上：审讯官向皮尔扎等人承诺只要承认罪行，说出同伙的名字，就可以得到豁免，然而这种承诺是不可能得到实现的，这不过是获取口供的手段。在经受了一系列严苛的酷刑后，皮尔扎虽然坚持不承认罪行，但也已经到了绝望的边缘，在这个时候审讯官承诺只要供出同伙就无罪释放，他没能经受住诱惑，说出了莫拉的名字。随后，法官们又用这种方式得到了一大批“共犯”的名字，并逮捕了他们。为了增强效果，这种虚假承诺通常和酷刑一同使用，利用酷刑摧残嫌犯的精神意志，在其崩溃的边缘给出豁免的承诺，诱使嫌犯屈服。在被捕的人当中，只有少数意志坚定的人，坚持不招供也不举报其他无辜者。

虽然不人道的酷刑在当今社会早已被禁止，但从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看，在文明欠发达的年代，酷刑被认为是有利于审讯顺利进行的合法辅助手段，因此这种审讯方式是古代社会的司法传统。然而在

耻辱柱事件中，酷刑作为逼供的手段被滥用，已经偏离了原本一般的审讯目的，成为这场悲剧的帮凶。

曼佐尼在《耻辱柱的历史》中对酷刑的历史做了一个深刻的考察，其中引用了意大利著名启蒙运动学者维利的著作《论酷刑》（*Osservazioni sulla tortura*）的观点。曼佐尼和维利的观点之间构成了一场对话，曼佐尼指出在司法制度演进过程中，立法者们曾尝试改进酷刑的使用，他认为酷刑的使用应当遵循法律规定，而不能成为审讯官肆意滥用的特权，立法者应当制定具体明确的规则来避免酷刑的滥用。

维利全然否定酷刑，他认为酷刑并非寻求真相的工具，无论是法律还是犯罪行为本身都不会将酷刑作为揭示真相的工具，而当这种方式被用来寻找真相，这在本质上便是不公平的。^{[5](20)}同样是反对酷刑，曼佐尼用生动的语言为读者描绘了皮尔扎和莫拉等无辜者的审讯过程，通过受刑者祈求的话语传达了他们内心的痛苦和绝望。曼佐尼指出酷刑之恶其实存在于权力的滥用之中。

曼佐尼关于酷刑话题的独特之处在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学者们反对酷刑的残忍、非人道以及无用性，而曼佐尼则从当时文明欠发达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对酷刑使用做出了更为广泛的观察和更为客观的审视。他承认封建落后社会背景下酷刑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他谴责非法且残酷的酷刑使用过程。例如，对于皮尔扎的情况，曼佐尼认为“在一次又一次愈加不合法且愈加难以忍受的折磨之后又开始施以酷刑，太不人道了，仅仅因为他拒绝承认听说过一件事以及知道团伙领导的名字。”^{[6](709)}有人会说审讯官使用酷刑是由于嫌疑人说了谎，对此曼佐尼认为“但谎言的判定该出自合法的证据，而不是出自判官的武断假设，这是非常普通且不可否认的原则。”^{[6](701)}

四、当世之用

《耻辱柱的历史》与《约婚夫妇》一样反映了年代久远的17世纪的意大利社会风貌，两部作品有互文关系。后者作为意大利近代经典浪漫主义小说，其文学性胜于思想性，而前者的思想性则远胜于文学性，并极具现代意义。

在当今世界，公平正义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基数。在总体实现小康的中国社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日益突显，尤其是在公平、正义、环境等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加，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了在发展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曼佐尼在《耻辱柱的历史》中展现的公平正义思想，主要体现在司法和理性两个方面，前者是对司法规范和公正的强调，后者则表达了对理性的尊重和呼唤。如果说司法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刚性框架，那么理性就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软性需求。

放眼现今中国社会，这部作品体现的司法规范和公正思想与我党依法治国的路线方针相契合。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需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由此可见法律在我国社会治理中的重要角色和作用。法律在人类历史上诞生得很早，在东西方古代文明中都能找到它的踪迹，例如古巴比伦的汉姆拉比法典、古罗马十二铜表法和先秦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但直到近现代启蒙运动之后法律才真正得到尊重和维护。法律是国家治理和稳定的重要工具，也是一种社会契约和规则，《耻辱柱的历史》中的米兰政府在民情鼎沸的状况下是否仍然遵循法律进行审判，这是曼佐尼在作品中考察的真正内容。显然，米兰当局司法人员的执法过程缺乏法律管控，因而出现了滥用酷刑的现象。与单纯批判酷刑的前人相比，曼佐尼更加犀利准确地找到了造成悲剧的根本症结：司法体制的不规范和执政过程中的无法可依造成了权力的滥用。因此，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是对执政、行政人员的约束，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手段，无论何时都应坚定执行。

除却司法规范，曼佐尼还通过贵族帕蒂拉和主角等平民在耻辱柱事件中的命运对比提出了司法公正问题。司法公正无疑是司法体制建设和依法治国实践过程中的基本内容，是司法规范的一种外在体现，也是社会公平正义最基本和最后的防线，使人民群众在各类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也是十九

大提出的司法努力方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自启蒙运动后就一直深入人心的法治理念和原则，19世纪初的曼佐尼通过耻辱柱事件这一反例抨击了过去的司法不公现象，为已经沉默的无辜死者发出了抗争的呐喊。曾经有历史学者批判曼佐尼的这部作品，认为他片面地认定所有人都是无辜的，事实上曼佐尼认为无论是无辜者还是有罪者都应该接受合理谨慎的审理，审判证据充足、逻辑严谨，他考量的是法官的审理过程，而非结果。而在耻辱柱事件中，法官在被告们的口供间存在明显逻辑漏洞的情况下仍然予以定罪，这显然不合法律规定；相反对于出身贵族的被告则审之又审，慎之又慎，与之前的态度截然不同。这种区别对待行为是应当批判且避免的，司法公正既需要司法规范来约束，同时也需要精神层面的法律平等意识作为准绳。

在耻辱柱事件中，除了司法上的不公正和不规范，理性的缺失也是悲剧的导火索。由瘟疫的致命性和传染性唤起的恐惧和焦虑在人群中渐渐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使得人们不由自主地相信关于瘟疫的谣言，相互猜疑，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使得情况变得更糟。关于瘟疫谣言部分内容曼佐尼在《约婚夫妇》中较详细地描绘了当时的情形，但他在这部作品中着墨并不多，但通过他的用词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愚昧行为的批判。社会的公平正义需要政府和人民双方的努力和相互配合，在政府依法执政的同时，群众应当保持理智，不信谣不传谣，积极提升自身知识素养和分辨是非的能力，从而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提供良好的环境与土壤。

五、结 语

曼佐尼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的平等思想具有非常鲜明的启蒙主义色彩，同时，他对愚昧的批判和对理性的呼唤又为作品营造出了一种理性主义氛围。19世纪初正是启蒙运动席卷欧洲大陆后，资产阶级革命如雨后春笋纷纷兴起的变革期，曼佐尼也深受启蒙主义思想熏陶。作为意大利著名启蒙主义学者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的外孙，虽然自小与父母分离，并在教会学校学习，但青年曼佐尼在米兰接触了许多启蒙主义思想者，之后和母亲旅居法国巴黎，在那里曼佐尼参与了巴黎启蒙主义知识分子间的集会，更加深刻地与启蒙主义、理性主义等思想进行了碰撞，为其今后的文学创作范式和风格提供了思想源泉。

少数人的生命与大局的稳定相比，孰轻孰重，这道选择题在曼佐尼看来是不存在的。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人的价值早已被肯定和歌颂，曼佐尼更是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他的文字浸润着根植在他内心深处的对弱者的同情，以及对高尚道德的褒扬和追求。他用清晰准确的文字再现了无辜者们遭受酷刑时的痛苦与绝望，和最后不得不认罪的无可奈何——在审讯室里，公平与正义是缺席的。

在曼佐尼的眼中，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是一切犯人都罪有应得，一切无辜者都不必蒙受不白之冤；不论高低贵贱，人的价值得到尊重，人的生命得到敬畏，人的理性得到弘扬。耻辱柱上的名字，记录的是建造者的耻辱，同时也是对后人的一种永远的警示。

参考文献：

- [1] Muratori, L. A. (1714). *Del governo della peste, e delle maniere di guardarsene*. Modena; B. Soliani.
- [2] Ginzburg, Carlo. (1989). *Storia notturna. Una decifrazione del sabba*. Torino; Einaudi.
- [3] Cottignoli, Alfredo. (1994). *Alla luce del vero*. Bologna; CLUEB.
- [4] Manzoni, Alessandro. (2009). *Storia della colonna infame*. Pisa; ETS.
- [5] Verri, Pietro. *Osservazioni sulla tortura*, e - text a cura di Claudio Paganelli. Retrieved 5 January, 2018, from http://www.deltacomweb.it/socio_sicu/osservazioni_sulla_tortura.pdf.
- [6] Manzoni, Alessandro. (1971). *Promessi sposi e storia della colonna infame*. Torino; G. Einaudi.